蔡申之：《清代州县故事》、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等等。尤有甚者，香港存萃学社编印的《清史论丛》一、二、三辑，全是当代学者写的学术论文，也编入了续编第 64 辑 。看来，主编是奉行史料就是史学这一信条的。还有一些赝品，也编进了这部史料丛刊，如《翼王石达开全集》、《太平天国诗文钞》等等。此外，沈云龙还主持编辑了《明清史料汇编》，全套 8 集，24开影印，精装共83册。

《明清稀见史籍叙录》评介

萧　林

武新立同志编著的《明清稀见史籍叙录》，共24万字，最近由金陵书画社出版了。

《叙录》一书内容丰富，共著录明清两代各种稀见史籍137种，其中明人著作71种，明末清初著作17种，清人著作49种。内有刻本书61种；抄本书43种；稿本书26种；其它活字本等 7 种，都是具有较高史料价值而又不见于别家著录的珍贵善本。因此，该书的出版，不仅是明清古籍整理和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研究的一个新收获，而且也是对明清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奉献。

明清两代文化典籍之丰富，是众所周知的，这些书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刊行面世，还有不少尚待发掘，鲜为人知。如何搜集和使用这些稀见之宝，是每一明清史研究者经常关心的问题。《叙录》可贵之处就在于，它把固锁秘室、未曾公诸于世的珍品揭示在人们面前。

从内容上看，该书所著录的137种史籍，绝大多数都是至今不见于别家著录的稀见之作，题材广泛，记事详明，史料可靠，对于我们研究明清两代的社会经济、阶级关系、典章制度、军事法律、民族问题、农民起义、历史地理、文化典籍、文学艺术、学术思想、人物事迹等，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使用价值。例如明末清初人著作中：邵潜纂修的弘光《州乘资》（四卷，抄本），对明末清初江苏通州地区的山川、河渠、风俗、官制、秩官、名宦、学校、武备、社仓、户口、馈运、岁课、赋役、艺文、碑记、人物等等，无不备载。彭孙贻的《靖海志》（四卷，抄本），更是流传稀少。谢国祯先生的《晚明史籍考》等都未曾著录。是书记郑成功一家三世盛衰事甚详，起自明天启六年其父郑芝龙扰攘闽山等地，至清康熙二十二年其孙郑克塽降清。这部著作是当时人写当时事，见闻多为可靠，是研究郑成功和明清之际史事的必读之书。

佚名辑录的《奏议撮要》（不分卷，抄本），共收顺治至光绪朝各类重要奏疏五百六十余篇，材料丰富，且皆军国大计，是研究有清一代的一部极为重要的文献汇编。世无印本，查寻不易。张集馨辑录的《同治平回奏谕》（一卷，抄本），则是同治年间清政府派兵弹压陕、甘、宁地区起事的回民和活动于该地区的太平军以及蓝朝鼎、蓝大顺兄弟领导的号军的奏谕选编，计七十三件。此书亦无刻本行世。徐毅编辑的《律例汇考》（十卷、稿本）和佚名撰的《律例简明录》（不分卷，稿本），都是研究清律的珍贵史籍。后者由律例本文和考证文两部分组成。在考证文内，作者以乾隆五年的《大清律例》为基础，对各条甚至每一律文，都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考证。它们可以为清律研究者提供重要的资料和线索。缪日藻撰、徐渭仁

修订的《寓意录》（不分卷，稿本），为历代书画作品录，收晋唐至明清五十家的稀世名品一百五十余幅，每幅分别以绢纸质、长宽尺码、印记藏家、墨色字体、题诗跋文等项进行著录并对作品的统传、真伪间作考证，对其价值和特点，也有所评论，可谓研究我国书法绘画史的一本宝书。缪荃孙的《艺风堂别钞》（不分卷），世无印本，涉猎广泛、材料丰富，是作者从当时近百种清人笔中摘录出来的、专记明清两代史事的资料汇编。由于年代久远，特别是由于兵火之祸，此书所引用的清人笔记材料，有许多今日已经不复存在了。因此更显出了这部著作的存世价值。他的另一部作品《艺风堂杂钞》（八卷，抄本），内容也相当广泛，有直接抄自内阁大库的材料，很少为人所知。书中收有天聪时诏奏、改土归流略、太平天国粤西起义诏书、钱牧斋及柳如是事迹等。书后附有西藏地区的政治、军事和英军侵略西藏等情况的考查记录，对于了解当时西藏的形势，颇有考查价值。王祖昌撰的《秋水亭文略》（嘉庆间稿本），是一部由孙星衍等五十多位名家精批细校、删补修订的文集稿本。至今还完好无损地保留着他们的墨迹。书中对乾隆间白莲教活动的一些记载，为他书所未见。

戴熙芠的《五湖异闻录》（六卷，稿本），保留下了太湖流域及其周边地带的历史地理、交通水利、农业生产、漕粮转输、丝绸纺织、自然灾害、习俗民风、人物传奇，尤其是太平天国在吴中地区的斗争事迹等一系列的宝贵史料。此外，郑鸿逵的《及春堂集》（初集一卷二集一卷）；方孝标的《钱斋文选》（六卷，抄本）；清人陈澧的《东塾杂俎》（十卷，稿本）；蒋良骐的《东华备遗录》（八卷、稿本）；姚启圣的《以俟集遗编》（一卷，稿本）、胡杰人的《赛竹楼杂俎》（不分卷，稿本）；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清末名人书信集》（一卷，复制本），也都无一不是今世不易见之书。

总之，在选材上严格挑选，既择稀见又重史料，这是《明清稀见史籍叙录》的第一个特点。

在深入挖掘稀有史籍、充分重视史料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精益求精，选录最珍贵的善本，这是《叙录》第二个突出的特点。读者从是书所选录的一百三十七种稀见史籍中，所以有幸看到明末军事家李元鼎、清代著名的文学家舒位、考据学家孙星衍、收藏家徐谓仁等人的批校本；明代文征明及清代毛晋、汪鱼亭、方功惠等一批名家所珍藏的善本。更为难得的是，钤有“乐天”、“勤学好问”之乾隆御章及“翰林院”大印的清代宫廷故藏。其余各书的版本也都是非常罕见的善本珍品，有的为海内孤本；有的存世极少；有的书写端庄秀丽，雄健有力，纸墨精绝，虽历时数百年而鲜艳如故；更多的则是可补他种版本残缺的全本，卷帙完整，文字无损。这些对于明清史研究者说来，都是极为宝贵的。

第三个特点是，在《叙录》的写法上，作者既注意撮取众家之长，又有自己的特色，自成体系，别具一格。具体表现在：《叙录》自始至终突出以介绍每一种史籍的内容为重点，但又不以此为满足，充分吸收了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对各种相关的问题进一步做了新的探讨，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对于书中所记载的史料，不限于一般的罗列介绍，而是尽可能地予以校勘考异，去伪存真，间有评论，同时兼及书的篇目、作者的生平事迹和版本流传情况。这种有点有面、点面结合的写作方法，不仅可以避免或者只作内容提要，或者只介绍著者和版本的偏向，而且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也是十分必要的，可以使人们从中获得更多的知识。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叙录》的作者还为读者摘录出许多不常见于他书的珍贵史料，从而为没有机会阅读原书的读者进行鉴别和择用进一步提供了方便。另外，《叙录》中还一一注明了著录诸书的收藏单位，这对于读者以后借阅查找也是一大方便。

最后一个特点是，实事求是，详略得当。人所共知，明清两代史书浩如烟海，其中不乏奇珍异宝。《叙录》从稿本、抄本、刻本三个方面选择了一百三十七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最早者写于明武洪年，最晚者成于清朝末叶，这些著作虽然都堪称稀见之宝，但是它们之间卷帙悬殊，内容不同，史料价值亦有差别，作者在撰写的过程中认真注意到这些不同情况。他在《凡例》中说：是编著录各书，“每书文字详略多寡不一，视书而定。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总观全书，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长者三千余言，短者则仅有数百字，不拘泥篇幅比例，该详则详，当略便略，一切从实际出发。这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也是很值得提倡的。

诚然，由于作者受到客观条件和视野的限制，《明清稀见史籍叙录》一书，在某些方面也有其不足之处。例如，对少数著作的评价，材料的去留，以及对一些历史事件的议论和少数历史人物是非功过的褒贬等，都有待于进一步加以研究。但是从总体上说，这些不过是无伤大雅的小节。

史籍的介绍，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这类书历来是很受欢迎的。可惜的是，建国以来这类著作问世的不太多，远远满足不了科研事业发展的需要。而象《叙录》的作者那样关心明清史的研究，呕心沥血为提高明清史研究水平贡献自己的力量，热情地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究研所图书馆和其他一些单位所收藏的一部分稀见史籍介绍给广大读者，更是不多见的。该书的出版已经引起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应海内外广大读者的要求，已正式决定于一九八四年中再版发行。我们相信，本书的出版也必将得到图书馆学界的积极响应，今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公私藏书者，“对自己的稀见珍藏详加介绍，让读者一新耳目，增长见识”，以充分发挥珍贵史籍在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应有作用。

«档房论史文编»简介

叶显恩

《档房论史文编》是韦庆远同志利用清代档案为主的一部史学论文集，约40万字。最近即将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该集共收论文15篇，其中除《论档案工作与历史学研究的关系》和《简谈金石档案问题》两篇外，其他都是1978年至1982年间撰写的。内容大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清代前期的社会经济；二是近代的政治制度；三是档案学与历史学的关系。

在第一、二组文章中，作者利用清代档案材料，参证其他图书文献，对清前期及近代史的若干历史问题作了研究，并提出了许多创见。第一组中的《有关清代前期矿业政策的一场大论战》一文，首次运用大量的有说服力的档案材料，对康、雍、乾三朝矿业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争论，政策的先后变化及其政治经济原因作了论述。说明在清前期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迅速发展过程中，矿业所处的地位日益重要，所存在的矛盾冲突日益突出而急需解决。乾隆初年所奠定的基本上开放矿禁的政策曾起过积极作用，是“康乾盛世”的产物，又对“盛世”的一定时期内仍能继续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清代前期的商办矿业和资本主义萌芽》一文则深入分析了清代前期的矿业召商承办以后的官商关系，指出清王朝前期开放矿业的政策，